

读顾千里“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”手稿

周 茹 燕

不久前，笔者去宁波天一阁访书，有机会读到清代著名校讎家顾千里朱墨校批的《仪礼注疏》真本。此书系明万历廿一年监本，共十七卷，六册。在本书的第一册内夹有黄底红格稿纸六叶，原书签条谓：“汪、顾序六叶。”经反复阅读、查对和初步分析、考证后，笔者认为这六叶稿纸当为顾千里“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”手稿。试述理由如下：

一、文稿两篇六叶，分别题为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和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》。前者署为“道光十年岁次庚寅秋九月长洲汪士钟序”，后者署名“元和顾千里撰”，显然这就是原书签条所谓“汪、顾序六叶”的依据。但从这两篇序跋的手写稿看，两者的署名虽然不同，而字体、笔迹却同样苍劲有力，墨色浓淡自然，所用稿纸不仅色泽、纸质、行款、格式完全一致，而且书口下栏皆印有“裕隆号”字样。由此可见，这两份署名不同的文稿实际上出于同时、同地、同一人之手。特别是将文稿与《仪礼注疏》手校本上的顾氏亲笔相比对，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单个文字的横、直、撇、捺，还是通篇字体的排列结构，都依稀彷彿，如出一辙。因此，这两篇手写稿当为著名校讎家顾千里之亲笔。

二、从文稿的内容看，将此稿与汪刻《宋景德官本仪礼疏》以及顾千里遗著《思适斋集》中同一序文相比较，则除了个别文

字略有出入外，其余完全一致。

汪刻《宋景德官本仪礼疏》五十卷，卷首有黄丕烈跋，汪士钟序和顾千里后序。经核对，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从内容到文字均与手写稿一一相符。而“后序”与手写稿的文字出入也仅有一处。即序文的首句，手写稿作：“道光庚寅岁闾原观察重刻所藏宋景祐官本五十卷贾公彦仪礼疏”。其中“景祐”之“祐”，汪刻本作“德”。景德是宋真宗赵恒（998——1021）年号，《贾公彦仪礼疏》系景德官本，这在“前序”中已经提及，“后序”手写稿作“祐”，当为笔误，应以汪刻本为是。

汪刻本刊于1830年（清道光十年），其序跋系直接根据手写稿写刻。1849年（清道光二十九年）在上海出版了顾氏遗著《思适斋集》。该书为海宁杨文荪于千里之孙瑞清处访得顾氏遗稿，写录清本，编辑而成。

在《思适斋集》卷七中收有这两篇序文。经核对，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》不仅从内容到文字均与手写稿一一相符，而且在标题下注明“代汪闾源”，可见所谓“汪序”，实为“顾作”，而序作者皆为顾千里无疑。

手写稿与“后序”的文字出入共两处，一为上述“景德”作“景祐”之误。另一为文中：“又何用如若膺大令待其晚年……”句中之“待”字，《思适斋集》作“及”。这里，“待”作“及”是文字上的细微差别，并不影响文意的表达和作者的判别。况且，手写稿上还有“待”、“及”改换的痕迹，这不仅能反映作者写作时的思维活动，更可以说明这两篇文稿实为顾千里之手笔。

“汪刻”、“顾集”中的“序跋”都是直接根据顾氏原稿刊印的，它们与天一阁所藏手写稿的一致，足以说明手写稿实为顾氏所书之原稿。

三、手写稿是否可能为藏书家或其他人所缮抄呢？这一问题值得考虑。但查阅手稿，发现六叶中有“后序”之草稿一叶，其

内容、文字与誊清稿出入很少（有出入处，为对段玉裁之态度，详见下文。）但曾多次涂抹修改。若是他人传抄，则既有誊清稿又何必连草稿也一起抄来？！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夹在天一阁所藏明万历监本《仪礼注疏》中的六叶稿纸当为清代著名校雠家顾千里之手稿。

顾千里，名广圻，号涧菴，别号思适居士。江苏元和人。生于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，卒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。他出身贫寒，但刻苦好学，于书无所不读，人称“万卷书生”。青年时代拜吴县江声为师。江声是吴派经学大师惠栋的弟子，他从江声那里尽得惠氏遗学，于经学、小学有很深的造诣。他涉猎广泛，学问渊博，不仅精通经、史、训诂，而且对天文、算术、舆地、诗、文、词、曲乃至九流、百家无不通晓。他又把自己丰富、渊博的知识集中地、创造性地运用到古书的校勘上，再加上“实事求是”的治学精神，严密精细的校勘方法，使他在校勘学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就，甚至被誉为“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”①。

顾千里学富五车，但在封建社会里却终生潦倒，郁郁不得志。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书的校勘工作，以替人校刻古书为谋生的手段。他曾先后为阮元、孙星衍、张敦仁、黄丕烈、胡克家、秦恩复、吴鼐、汪闳源等人校刻珍贵古籍，本文所述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》就是他为汪闳源重刻宋景德官本贾公彦仪礼疏五十卷所撰的“序”和“后序”。

顾千里为汪闳源撰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》是在1830年（道光十年庚寅），当时千里已达六十五岁高龄，在版本的鉴别和校勘上已是造诣精深、名传遐迩了。

在“前序”中，他首先记述了《宋本仪礼疏》的版刻源流。指出“仪礼合疏于经注，而并其卷第，始自明正德陈凤梧，迨李元阳以下皆因之。从事校雠者多言其讹。而宋景德官刊贾公彦元分五十卷不合经注之疏，与唐旧新志同者，则均未得见也。宋槧

残本幸存，仅缺去卅二至卅七，无恙者计卷尚四十有四。嘉庆初入吾郡黄氏，于是张古余太守得其校本，别合严州经注，重编于江省。后阮宫保取配十行不足者也。惟时段若膺大令亦得此校本，谓之单疏仪礼，亦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，而单疏之善，既有闻矣。”这里仅用寥寥百余字就将《宋本仪礼疏》的来龙去脉及张、阮、段诸家校本的特点剖析得清清楚楚。

接着，他又指出汪氏艺芸书舍重刻宋槧的目的，在于“念世间无二，遂命工影写重雕之，以饷学子，使数百年来弗克寓目者，今乃可家置一部。”也就是说，重刻宋槧是为了保存古籍，传播文化。在二百多年前的当时，不少人藏书刻书不是为了图名求利，便是把文化古籍当作“私产”，但求藏之秘阁，传子传孙，永世宝之。而顾氏却以传播古籍、沾溉后学为校刻家之责任，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，别有卓识！

顾千里曾以“日思误书”、“不校校之”为治学的一大乐趣，他校勘古籍亦以“不轻易以意改之”为特色。“前序”的最后部分记述了《宋本仪礼疏》的版本特点以及这次重印的校勘凡例。着重指出这次重刻宋本乃是“行摹款仿，尤传景德之真。”有些地方儘管有出入，也不轻易“撰定异同”，而是宁可“阙如”以待读者“悉心寻绎，原文自见。”这充分反映了顾氏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。

至于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》则是对“前序”的补充说明。顾千里在这篇跋里，进一步论证了“贾公彦仪礼疏”的价值和作用。他指出：“读疏为治经之先务”，而“读贾公彦之疏由之以晓经注之意者最多。并以贾疏“合乡饮酒、乡射燕三篇之注周南召南者而疏通其意”为例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，说明贾疏的优点，言之有据，富有说服力。

在“后序”里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顾千里对段玉裁的批评。1792年（乾隆五十七年壬子），段玉裁与顾千里相识于苏

州。当时段已是蜚声海内的著名学者，而顾却是初出茅庐的青年。但两人一见如故，段氏对千里很欣赏，曾赞千里曰：“其人尚未进学，而学在在车（藏庸）之上，校书最好。”^②又谓千里曰：“音韵表解人，昔为高邮王怀祖（念孙），今乃得足下耳！”^③大为推重。

后来，段、顾二人为了“酉”和“四”一字之异曾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，此后关系即告恶化。对于段、顾争论的是非，由于他们各具深湛的学问，所以同时及后来的许多学者很少加以评论。但由于段玉裁的地位、声望都在顾千里之上，所以人们不免有些右段左顾的偏向，有的人对顾千里大加指责，认为他“措词尖刻，意气偏激”缺少学者风度，缺乏对段玉裁应有的尊重。这样的批评似乎也有失之片面、偏颇之处。

从已经发表的《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》来看，顾千里确实对段玉裁提出了批评，他在指出“贾疏”的优点后说：“又何用如若膺大令及其晚年别读先王之所以教郑注，而后始见其或不言文王、或言文王有不合，仍未述及贾公彦具有明文，转谓从前不能知此哉！”

这一段话，在笔者所见的原文草稿上曾作过多次修改。

草稿原作：“又何用如段若膺氏待至七十有四之年别读诗序先王之所以教郑注，而后始疑其或不言文王或言文王之不合哉！用是推之，治经者必以读经为先务，断断然矣。否则此方自以为独得之秘，不知贾公彦早已先言之明且畅矣。”后将“何用”改为“何待”，“待至”改为“逮至”，“七十有四之年”改为“晚年”，并删去了最后“否则此方……明且畅矣”二十五字，而在“不合”后面加了“仍不知此疏早有明文”九字，以后又将所加之文改为“仍不知贾公彦早有明文转以独得自诩”。再以草稿与誊清稿或正式刊印之文对照，则可发现后来又作了修改，除将“何待”、“逮至”仍改回“何用”、“待至”外，还将“段

若膺氏”改为“若膺大令”，将“仍不知贾公彦早有明文转以独得自诩”改为“仍未述及贾公彦具有明义，转谓从前不能知此哉！”

从这些删改中，可以看出顾千里对段玉裁的态度：一方面，他对作为大师、前辈的段玉裁是很尊重的，他在“后序”的修改中，主要是去掉了那些措词尖锐，态度不当的用词。另一方面，他在学术上又是富有创见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。

1808年（嘉庆十三年戊辰），七十四岁的段玉裁写了《读诗序、礼经二注》一文。（《经韵楼集》卷一）段氏在读了郑康成关于“诗序先王之所以教”及“仪礼乡射礼乡饮燕”二注以后，将“礼注自相铍铍处，礼注与诗序不合处，又诗注、礼注为舛阙字处”一一加以详尽的考证而得出古本“或言文王”、“或不言文王”之“不合”。这应该说是自成一家之言的。但正如顾千里所指出的，若以段氏之考证与贾公彦仪礼疏中同一内容（见《宋景德官本仪礼疏》卷九）相比较，则贾氏之疏不仅早就发现了《仪礼》“乡饮酒”、“乡射”、“燕”三篇之注周南召南者“或言文王”、“或不言文王”之“不合”，而且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作了分析，并进一步阐发了经文的意思：

“郑注乡射云：昔大王、王季、文王始居岐山之阳。彼兼言文王者，欲见文王未受命以前，亦得召南之化。知者案：《羔羊》诗序云：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。《标有梅》序云：召南之国，被文王之化。此不兼言文王者，据文王徙丰受命之后，专行周南之教。是周南十一篇，唯言文王之化，不言大王、王季也。”贾公彦的分析明朗畅达，启迪后学，能够使读者不仅知其然，而且知其所以然。这比段玉裁的见解确实是更胜一筹的。

由此可见，顾千里一方面很尊重段玉裁，另一方面又能对段玉裁在学术上的某些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意见。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，这对于追求真理、繁荣学术无疑也是有益的、必要

的。

顾千里十分珍爱《宋景德官本仪礼疏》，曾屡夸此书“在宋槧中为奇中之奇，宝中之宝”^④。汪闳源重刻此书“写刻绝精”，几可乱真。今天我们阅读顾千里“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”手稿，对于了解此书版刻特点，版本源流是十分有益的。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顾千里既尊重前辈、又不迷信“权威”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以及他的某些校勘思想。这些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因此，这份手稿将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顾氏校勘学中的一些宝贵经验，更好地为整理古籍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服务。

注：

①日本神田喜一郎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。

②段玉裁《经韵楼集补编·与刘端临第十一书》。

③顾千里《思适斋集·卷十一·刻释拜序》。

④汪刻《宋景德官本仪礼疏·黄丕烈跋》。

